



思想史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

主 编 吴晓明 副主编 邹诗鹏（常务） 王金林

青年马克思与启蒙

黄学胜 著

 復旦大學 出版社

思想史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

主 编 吴晓明 副主编 邹诗鹏（常务） 王金林

青年马克思与启蒙

黄学胜 著



 復旦大學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年马克思与启蒙/黄学胜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8
(思想史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吴晓明主编)
ISBN 978-7-309-09834-1

I. 青… II. 黄… III. 马克思主义-研究 IV. A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37600 号

青年马克思与启蒙

黄学胜 著

责任编辑/方尚苓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7.5 字数 281 千

2013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9834-1/A·25

定价: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0JJD710003）
复旦大学“985工程”人文学科整体推进项目“思想史视域中的马克思
主义哲学研究”（项目编号2011RWXKZD005）
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二五”（2011年）规划项目
唯物史观与启蒙：一个批判性的研究（项目编号：12ZX16）

“思想史视域中的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序

吴晓明 邹诗鹏

近些年来,我们与国内外的一些同仁一起,致力于推进和深化思想史视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作为终结西方古典自由主义传统,实质性地开启现代思想变革,进而全面影响现代世界并开创现代新型社会科学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史视域中有着十分丰富的关涉和至关重要的影响。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视域的研究被长时间地延宕了,而其中的很多部分还停滞在粗疏草率的理解中。

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史中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其实质是从启蒙思想及其古典自由主义向唯物史观及科学社会主义的转变。列宁曾把马克思主义的来源概要地确定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德国古典哲学。这三个来源,正是欧洲近代启蒙传统在三个主要欧洲民族中的思想或理论表现。马克思主义超越三大启蒙传统的突破口,则是古典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兴起之时,正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巅峰。英国的自由主义走向成熟并与保守主义相关联,法国的自由主义成为异质于保守主义的激进思潮,至于德国则刚刚形成其独特的自由主义思潮。青年马克思从自由主义经激进民主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的转变,集中体现了当时欧洲从古典自由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在理论高度上,马克思主义无疑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与光大者。不理解德国古典哲学,就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潜存于马克思文本中的很多思想,其“互文”结构往往需要回溯到德国古典哲学,如青年马克思思想中的康德费希特因素,黑格尔的法哲学、社会哲学、精神哲学、历史哲学、辩证法等对马克思的影响,等等。但是,这样的研究不是要将马克思还原为德国古典哲学。在从德国古典哲学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中,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

展,从问题的提出到问题的解决,都从属于一个完整的思想史脉络,即世界历史的“德国站”是如何展开的,马克思的努力又在于如何超越这一“德国站”,从而要求通过科学社会主义重新规划世界史。就此而言,不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能真正理解和穿透德国古典哲学。

然而,从思想史视域中研究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哲学的方面,而应当如马克思学说本身那样,包含应有的学科丰富性。其中尤应以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为重点,正是这个领域包含着思想史上的丰富内容。

在欧洲思想史上,从古典自由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反过来又激起了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传统的变革及其回应,其结果是古典自由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以及保守主义借民族主义的全面兴起——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世界民族主义的兴起及随后展开的全球性的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既是马克思主义参与的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需要面对的新课题。在很大程度上说,正是联手应对马克思主义传统,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这两大曾经对抗的社会政治思潮,逐渐协调起来,并于19世纪70年代形成“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至于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新古典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更是强调与新保守主义的同一,以抗衡马克思主义。

与自由主义传统的转变与保守主义的回潮相伴随的,则是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兴起,其基调是在马克思主义形成之后再度复兴的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是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石,其学科典范即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无疑打击了自由主义的基本理据。但是,19世纪50年代前后,以约翰·穆勒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开始了重建并重释政治经济学及其实证主义传统。接下来即是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社会哲学迅速发展起来。其中,迪尔凯姆的实证主义的社会学及其深受实证主义传统影响的马克斯·韦伯的解释的社会学,直接开创了具有学科意义的现代社会科学。马克思、迪尔凯姆与马克斯·韦伯,虽然都是现代社会科学的开创者,但在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学术定位方面却有着巨大差别。

在现代学术界,有一个现象应当引起马克思主义研究界的高度关注。在国外有关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研究中,来自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学术传统的尤多,诸如曼海姆、哈耶克、以赛亚·伯林、列奥·施特劳斯、熊彼特、波普、阿隆、萨特、阿伦特、福柯、鲍德里亚、福山等,都在不同程度上研究过马克思主义史。他们研究的目的,则是通过清理和反思马克思主义史,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现代性世界展开过程中的一段插曲或一个必经的阶段,从而“反证”自由主义与保

守主义。

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当然有必要重视来自外部的批判。但现在的情形却呈现出“一边倒”：现代自由主义及保守主义基于思想史对马克思主义展开的实质上否定性的研究，远远超过马克思主义从思想史层面对现代自由主义及保守主义传统的批判性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及误读，实质上是以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社会政治立场为前提的。因此，的确不能把由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设定的带有价值判断的论题，当成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的现成课题。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存在论层面的论证与阐释，与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及其思想史层面的拓展及开掘，乃是内在相关的。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及其实践的反思，也有赖于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史上展开的自我批判。因此，问题并不在于要拒斥或撇开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的思想史研究，而在于在参考、借鉴且批判这些资源的前提下，推进和深化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进而提升马克思主义研究本身的水平和质量。

应当承认，相比于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历史，相比于目前马克思主义文本、基础理论以及现实研究，相比于自由主义及保守主义的思想史研究传统，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史方面的研究是不足且滞后的。既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也多是对马克思主义形成与发展的“内史”研究，缺乏思想史研究应有的开放性与比较视野。然而，一门基于某种政治思想理论的学说或学科，必须具备明确的思想史研究或历史分析的自觉意识及其规范基础。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进一步研究不仅十分必需，而且大有可为。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资本主义同质性的加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对马克思主义的漠视与排斥变得越来越明显。以实证主义为学术基础的现当代西方主流社会科学，无批判地论证并解释现当代资本主义，晚近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社会科学，更是只限于资本主义之一维。如果说，从19世纪7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到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革命为止，西方主流学术界还有兴趣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性的资源，那么自20世纪80年代新保守主义及新古典自由主义兴起以来，西方主流学术界则越来越拒斥、而不是吸取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资源。新古典自由主义及新保守主义对学术界的宰制，意味着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已不可能从内部产生批判性资源。

在现代条件下，保守主义不过是自由主义作为主流社会政治思潮的补充形式。而马克思主义既承诺了现代性，又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分析推进了现代性批判，进而使思想向着未来的筹划深入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之中。马克思

主义的批判,曾使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两大传统实现了某种转化,但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在对抗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传统中,实际上又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的未来向度,并逐渐建构了一个同质化的世界。但是,这个拒绝批判性介入的同质化世界,真的能够无限制地持续下去吗?这一度是德里达、罗蒂、乔姆斯基等深感不安的问题,也是福山、奈斯比特等人关注的问题,更是众多激进左翼理论家焦虑而无解的问题。无疑,对这类问题的深入研究,必须要超越新古典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的话语框架,并重新注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在全球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空间中,把马克思主义当年在近现代转型中发挥的巨大思想资源,再次释放出来。如是,则马克思主义研究不仅不缺乏,反而更具有思想史研究的广阔空间与优势。

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相比,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有着开展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得天独厚的现实基础,这就是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道路。这一被标举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在其新的世界历史方向上形成的积极成果,也是一条有希望洞穿全球资本主义困境,因而异质于新自由主义及新保守主义、并在未来的人类文明格局中有更大责任及作为的道路。对于这一已然扎根于并直接推进当代中国历史性实践的道路,显然需要、也值得展开思想史层面的广泛研究:中国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抉择;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诸多现代社会政治思潮对话及其历史效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的现当代转化的内在关系;中国道路与世界历史逻辑的重述;中国道路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现当代变革等,都是一些极有价值的思想史课题。

我们把思想史视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理解为一项任务。这一视域所蕴含的丰富内容,当有待于来者辛勤而富于洞见的发掘与开拓。本质地说,马克思主义是具有自我批判精神、与时俱进、并因此显示其当代性质和当代意义的哲学与现代社会政治理论。如若以更为自觉的问题意识及学术担当,来从事思想史视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这一研究领域将很快迎来它的繁花盛开。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马克思面对的近代启蒙思想传统	11
第一节 启蒙的主题：“主体性”的彰显	11
第二节 启蒙时代的思想原则和特征	16
第三节 启蒙理想的规划	23
第四节 启蒙的实践与困境	33
第二章 青年马克思对启蒙原则的信奉和实践	41
第一节 启蒙主义：马克思学生时代的思想主流	42
第二节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启蒙原则的实践	52
第三节 “物质利益难题”：马克思怀疑启蒙的最初理论环节	60
第三章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对启蒙的反思、批判及其原则立场 ...	67
第一节 反思启蒙：马克思对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观的批判	69
第二节 批判启蒙：“现代解放”仅仅是政治解放	84
第三节 新的原则立场的确立：超越“当代现实”	94
第四章 理性形而上学批判：马克思的“感性对象性活动”理论对近代 形而上学的瓦解	103
第一节 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理性形而上学批判	103
第二节 黑格尔哲学：近代形而上学的完成和现代社会的观念论 “副本”	106
第三节 “现代批判运动”与费尔巴哈哲学的贡献与缺失	122

第四节 马克思的“感性对象性活动”理论对理性形而上学的瓦解	133
第五章 “启蒙国民经济学”批判：对作为现代国家基础的市民社会本质的揭示	147
第一节 “启蒙国民经济学”思想传统	148
第二节 马克思对“启蒙国民经济学”的批判	159
第三节 “启蒙国民经济学”批判作为对启蒙的批判	176
第六章 法国唯物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批判：“实践的人道主义”的提出及其对“当代现实”的超越	182
第一节 法国唯物主义与启蒙及其批判	184
第二节 空想社会主义与启蒙及其批判	192
第三节 “实践的人道主义”：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对“当代现实”的超越	199
第七章 马克思哲学的诞生：由启蒙向唯物史观的转化	215
第一节 青年马克思探索的独特性及其与唯物史观的思想关联	216
第二节 唯物史观及其对启蒙的批判与超越	229
第三节 《资本论》及其手稿对近代启蒙主义批判的继续	249
结语：敞开马克思哲学的当代视域	258
参考文献	264
后记	272

导 言

一

西方 18 世纪的启蒙运动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当今时代的社会形态、政治形态、意识形态等各方面得以塑造和形成显然都与历史上的启蒙运动相关。启蒙是进入现代社会的开端,促成了现代性的生成。启蒙同样是现代社会在不断追求的目标,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成。在这个意义上,若要理解现代性社会及全球现代化的进程,特别是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及其各种现代性问题,必定要从启蒙开始。

福柯曾于 1984 年在《什么是启蒙》中指出:关于“什么是启蒙”的问题是一个两百年来以各种形式不断重复的问题,也是现代哲学从未摆脱、一直在设法回答的问题。从黑格尔,中经尼采或马克斯·韦伯,直到霍克海默或哈贝马斯几乎一切哲学都未能成功地面对这同一问题,“现代哲学就是这样一种哲学,它正在试图回答这个两世纪前如此鲁莽地提出的问题:什么是启蒙?”^①诚如福柯所言,启蒙问题作为现当代哲学的核心问题,同样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不断追问和反思的根本问题。

反思启蒙的内在动因来源于对“人类往何处去”的疑惑和回答。启蒙运动所发动的社会的和观念的变革,特别显著地与启蒙理性问题纠缠在一起,对于启蒙理性,人们曾经抱着积极乐观的态度,认为启蒙理性是人类社会的根本追求,是人类解放的根本手段;它不仅能带给个人自由、平等、幸福,还能为社会建构一套理想的社会秩序,实现人类的“永久和平”或“千年福祉王国”。启蒙的推进,的确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全球社会的整

^① 福柯:《什么是启蒙》,见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2005 年版,第 422—423 页。

体“繁荣”，然而，与之相伴的同样还有工业的废气、世界大战的硝烟、核弹的蘑菇云，还有难以预测的生态灾难、恐怖的大屠杀，以及社会秩序和人心秩序的失范、价值的虚无化、人的物化等。启蒙的后果是被伯尔曼称为现代社会的“整体性危机”。这种危机核心是“生活的意义何在，他们被引向何处去”，意味着“我们的全部文化似乎正面临一种彻底崩溃的可能”^①。因此，如何从危机走出来，如何批判和建构一种经过反思的成熟形态的启蒙精神，从而推进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已然是整个时代的人们都必须面对和回答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20世纪60年代以来，“后现代”的到来以及后现代景观的不断呈现，加剧了人们对启蒙问题的反思和批判。对后现代社会或后现代性的理解内在地蕴含了对现代性本身的认识和理解。现代性根源于启蒙，所谓现代化的进程不过是启蒙精神在社会各个层面地展开，因而以福柯、德里达、罗蒂、利奥塔、布尔迪厄等人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者，便把矛头对准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宏大叙事”在当今时代是否仍然有效？启蒙运动所导致的科学技术及其理性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如何来克服或限制？进而言之，现代性的自我反省必然意味着要对启蒙所持有的理性、经验主义、科学、普遍主义、进步、个性主义、宽容、自由、统一的人性等观念展开进一步的反思和批判。这项任务，人类至今并未完成，还有待深化。因此，当今时代，无论是主张启蒙规划已经终结的观点，或是坚持启蒙规划尚未完成的立场，抑或主张对启蒙规划展开批判性反思的观点，都毫无疑问地从属于这一思想主流。这也反映了启蒙本身的辩证法，启蒙运动的历史，不仅是启蒙运动的拓展史，同时也是启蒙运动的反思史。作为反思启蒙的思想家，卢梭、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尼采、韦伯、弗洛伊德、哈贝马斯等无疑是其典型代表。

由于时空的差距，中西方的启蒙必然表现出明显的不同。当西方已经完成了现代性的建构并开始全面展开现代性的反思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现代性的建构倒更像哈贝马斯所说的，是一项未完成的规划。当下中国，由于全球化的扩张和“地球村”的形成，尽管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后现代、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等当代思潮的影响，但正如俞吾金教授用马克思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形态学时间”考察当代中国社会所指出的，当下中国其实仍然与启蒙时期的欧洲社会在文化形态是“同时代的”。由于历史上的某些原因，启蒙精神一直处于一种边缘甚至缺失的状态。因此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更需要重建一种不同于欧洲

^① 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5页。

人的经过反思和修正的启蒙精神^①。

事实上,思想意识的“启蒙”一直是我国社会文化研究中的基本话题。学界对20世纪我国三次重大的启蒙运动即“五四新文化运动”、“延安整风运动”、“真理问题大讨论”的反思和讨论由来已久,这些讨论至今也仍在继续。当今中国无疑仍然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阶段,各种现代社会问题诸如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等层出不穷,究其缘由,尽管不乏市场经济、民主法治等不够发达或不够健全的因素,但在文化心态上却的确与历史上不成熟的启蒙密切相关。在这个意义上,也的确需要重建一种经过反思和修正的启蒙精神,这种启蒙精神理当是成熟的、能够促进人类世界和谐持续发展的。这其实也是学界长期关注和讨论启蒙问题的核心所在。有一些研究者甚至有感于社会的危机状况,为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提出了当今时代应当积极推进新的启蒙运动,以继续实现“五四”启蒙运动被中断了的民主和科学理想——其核心是保障个人权利、推进经济市场化、实现政治民主化(宪政民主)^②。应当看到,当今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讨论其实也内在地蕴含了某种成熟的思想价值的重建。

二

然而这种重建,却不应该重走西方现代性已经走过的路程,不能以西方的启蒙和现代性作为我国的启蒙和现代性的目标与标杆。在“启蒙有待于继续和完成”的口号下,也不能有意或无意地回避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实现了的对现代性社会的批判性和超越性成果。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曾经被教条化,并产生了许多消极的社会影响,但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却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目标的理解与掌握,还有待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特别是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进行准确定位和恰当理解。这也是当今时代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的首要和核心问题。

作为我国政治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内在地需要积极介入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推进思想领域的价值构建,这样才能避免学究之谈,真正发挥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指导作用。我们以为,当今时代的任何理论努力,显

① 俞吾金:《启蒙的缺失与重建——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思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② 参见资中筠:《启蒙与中国社会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然都不能撇开马克思哲学,而应积极从马克思哲学中寻找必要的思想资源。这不仅因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作为世界性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内在地参与到现代性社会的批判和修正过程中去了,对我们国家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已经嵌入了民族生命的实践体验中;而且还因为,马克思哲学本身蕴含了丰富的现代性社会的批判和重建资源,对启蒙和现代性问题,马克思哲学也是最早展开批判性反思的思想家之一。当今思想价值的重建应当防止完全依循西方启蒙运动的逻辑而展开,更应当防止重新回到马克思所超越了的启蒙理想的幻境,这种重建一定是建立在马克思哲学的基础上的,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真正重建一种服务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且又经过了反思和修正的启蒙精神。

事实上,马克思哲学与启蒙从一开始就有着内在的思想关联。黑格尔说,“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马克思说,“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①,这里的时代正是“启蒙的时代”、“理性的时代”。马克思哲学的问题意识显然是来源这个启蒙时代,当然又是要超越这个启蒙时代。在这个意义上,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而言,启蒙及其各种后果正是其基本的思想语境和问题域,而对启蒙现代性的持续关注和探讨则是马克思哲学及其各种批判的基本主题。正因此,许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悉尼·胡克就认为,马克思“是一个真正的启蒙运动的产儿”^②。日本学者城塚登也指出:“马克思思想的出发点就在于法国的启蒙思想。”^③英国当代著名的地理学派马克思主义者戴维·哈维也说:“马克思在很多方面都是启蒙思想的儿子。”^④英国学者伯尔基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根本属于欧洲政治和社会理论的主流传统,因此,进入马克思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核心——的最佳途径是研究它在这一传统母体中的起源。”^⑤这些学者肯定了马克思哲学与启蒙之间的思想关联,尽管他们更主要是把马克思当成了启蒙思想的继续者和传承者,并没有对其论点展开深入阐述,然而就其对马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0—121页。

② 悉尼·胡克:《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金克、徐崇温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4页。

③ 城塚登:《青年马克思的思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尚晶晶、李成鼎等译校,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

④ 戴维·哈维:《后现代状况》,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3页。关于马克思是启蒙之子的说法,其他学者也有类似说法,如 Coser, Lewis A. *Masters of Sociological Thought*.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Colledge Publishers. 1997. p. 70; Sarup, Madan. *Post-Structuralism and Postmodernism*.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3. p. 186。

⑤ 伯尔基:《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伍庆、王文扬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思哲学与启蒙之思想关联的肯定而言,无疑提示我们,要真正理解马克思,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努力及其哲学革命,不能离开近代启蒙的思想背景。至于马克思哲学与启蒙到底是何种思想关联,则有必要进一步考察马克思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对启蒙的反思、批判、继承和转化关系,并且在近现代的思想转换的时代背景中展开进一步的思想史的考察和领会。

这种考察和领会也有助于拓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认识和理解。学界一般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源归结为德国古典哲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方面,也更主要的把注意力集中在了马克思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马克思哲学与康德和黑格尔哲学的关联上,凸显了马克思哲学或唯物史观对近代形而上学的批判和超越,突出强调了马克思哲学在哲学方面实现的思想革命。然而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三个基本来源的更为根本和直接的思想前提还是近代启蒙,简言之,德国古典哲学就被称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则被称为“启蒙国民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更是被认为是法国唯物主义的进一步衍生。因此,这就需要从启蒙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加以揭示,因为,如果脱离了启蒙,不仅很难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大组成部分为什么要提出,以及它们的内在精神实质的一致性何在,也很难理解马克思对这三者的批判综合是有机地而不是机械地统合在一起的。况且,仅从马克思哲学对近代形而上学的批判和超越方面强调马克思实现的哲学革命,多少会忽视马克思对近代启蒙所带来的其他一系列问题的批判和处理,这些问题包括:启蒙的逻辑与界限、政治解放的限度、现代性社会的本质以及社会主义传统的问题与出路等。应该说,由近代启蒙而来的整个现代世界是总体性地呈现给马克思的,形而上学的问题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马克思试图批判和超越的也是整个现代世界,而不仅是近代形而上学,相反,马克思对近代形而上学的处理恰好应当放在马克思要超越和批判的整个现代世界的视域中才能得到真正理解。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的认识和把握,还有必要对学界一直存在的“两个马克思”的争论做出回应。国外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两个马克思”的争论,特别是以阿尔都塞提出的“认识论断裂”这个论断最为典型,影响也最大。这种观点的危害在于,创造出了“内部对立的马克思”。阿尔都塞之所以得出这个错误结论,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将青年马克思理论探索归入了启蒙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行列中,这不仅混淆了青年马克思的哲学努力与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理论追求之间的根本区别,还人为地割断了青年马克思向成熟马克思转

变的各种可能性。其后果就是,不仅堵塞了我们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研究的各种可能性,还使得唯物史观成了“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成了一种横空出世的产物^①。我们以为,将青年马克思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启蒙学者等同起来,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追求变成价值“应当”,最终将马克思对现代性社会的实践批判和社会历史批判变成一种道德批判,这不符合马克思的理论实际,也不符合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要破解“认识论断裂”,一个关键的环节就在于对唯物史观与启蒙的实际关联做出澄清。承认马克思的理论探索与启蒙学者有重大区别,唯物史观正是马克思从启蒙传统中出离和突破出来的基本成果。

作为现代性的主要批判家,马克思无疑是十分关注和批判资本主义的“当代现实”的。批判“当代现实”最根本的是批判资产阶级的启蒙无法真正克服自身的局限,也无法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平等。因为马克思敏锐地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深刻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尽管是一种巨大的解放力量,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人的思想的解放,但它同时却是一种压迫性质的社会生产关系;作为一种巨大的压迫力量,在对无产阶级压迫的同时,资本主义撕碎了温情脉脉的面纱,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严酷的权力关系和社会关系^②。资本主义社会借助人全面异化、抽象劳动对具体劳动的奴役和统治、资本对世界的统治等,揭示的正是现代社会自身的内在限制,它尽管解放了生产力,却也桎梏了新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解放的最终实现。因此,现代性的辩证法必然推动资本主义的自我扬弃,从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未来社会的发展无疑必须全面超越启蒙的思维方式和理论基础,必须全面超越资本主义的“当代现实”。对马克思来说,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是社会生产力的彻底解放,才是人的自由、平等、社会的普遍公正和人与自然的普遍和谐的真正的人类解放的真正实现。因此,我们以为,马克思哲学努力的根本目的在于,揭示启蒙和现代性的自我扬弃,进而总结和提升为唯物史观这一基本成果。

三

因此,本书的研究目标是,以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为基本文献,以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为基本线索,以文本解读与哲学思想史解读相结合的方法为基本的研究方法,试图揭示青年马克思由启蒙向唯物史观转化的内在逻辑和现实可

^① 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杜章智校,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25页。

^② 参见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8页。

能,即揭示青年马克思如何批判和出离于近代启蒙思想传统,从而最终实现对启蒙的批判和超越使唯物史观得以诞生出来的思想轨迹。作为一项有关马克思哲学的发生学研究,我们力图将以唯物史观为基本成果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置于马克思的思想努力与西方近现代思想史的转变之关联的视域中加以把握,探讨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及其与近代启蒙思想传统的关联性、差异性和超越性问题,为进一步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今时代的文化重建或建构一种经过反思和成熟形态的启蒙精神,提供思想基础。

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启蒙问题的重视,近年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探讨,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出现,这表明学界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意识形态和人道主义论争、90年代各范式确立和路径选择之后,如今的研究思路越发扩展,研究中心越发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典及其思想史意义。学界目前不仅看到了启蒙主义作为马克思青年时代的主要思想和主要理论来源的重要意义,而且还从三个方面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近代启蒙的批判和超越性方面,这三个方面主要是:重视马克思实践活动对启蒙理性的批判和超越;强调马克思提出的人类解放思想对启蒙的政治解放(主要表现为强调政治自由)的批判和超越;在个人价值观方面,强调马克思“人类解放”的价值目标,这表现为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对启蒙的个体主义价值目标的批判和超越性。

这些成果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对于我们的研究主题,无疑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但目前的研究显然还并不充分,马克思与启蒙的关系的研究尚未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话题,一些零星出现的论文也只是—般性的评介或就单个问题的专门探讨,在广度和深度上亟待深化。我们以为,其中首要的基础和关键问题就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启蒙之实际关联进行原著解读和思想史解读,也即从青年马克思的原著中较为系统和集中地梳理出青年马克思与启蒙思想传统之间的批判和超越关系,在此基础上,揭示和领会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与启蒙思想传统之间的同质性因素和异质性因素,从而为深刻理解和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而为充分展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的批判性对话,提供基础理论支撑。其中,特别需要阐明青年马克思对近代启蒙思想传统及其后续形式(包括法国社会主义、德国古典哲学、历史主义、浪漫主义等)的批判性和超越性方面,需要将马克思对政治解放的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黑格尔哲学批判、法国唯物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批判结合起来考察。这里涉及的问题是,一方面看到启蒙传统本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其他各种思想资源的前提性与基础性意义,另一方面又要深入挖掘出唯物史观对启蒙思